

一个西欧法律工作者
访问新中国印象记

罗伯特·哈梅德

B13459 / 12

法律出版社

統一書号:6004·250

定 价: 0.08 元

一个西欧法律工作者访问 新中国印象记

罗伯特·哈梅德著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国际联络部^译

法律出版社

1958年·北京

Robert Hamaide
LA CHINE NOUVELLE
SI PEKIN M'ETAIT CONTE...

一个西欧法律工作者访问新中国印象记

[比]罗伯特·哈梅德著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国际联络部译

*

法律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四牌楼十二条老君堂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内部发行组发行

*

787×1092 耗 $\frac{1}{32} \cdot \frac{13}{16}$ 印张·14,000字

●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5) 0.08元

统一书号: 6004·250

譯者說明

罗伯特·哈梅德先生是布魯塞爾上訴法院律師，現任比中友好協會副主席。他於一九五六年四、五月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邀請，作為西歐法律工作者代表團的團員來我國訪問，歸國後撰文報導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司法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觀感。原文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布魯塞爾“最後新聞報”連續發表，現譯出以供參考。

原文題目是：“新中國——如果有人對我談北京……”，現改稱：“一個西歐法律工作者訪問新中國印象記”。

“不久以前，布魯塞爾‘最后新聞報’发表了众議院議員雅各·范·德爾·叙埃倫先生的訪華觀感。他曾經率領一个工商业家的代表團去過中國。

“从今天起我們將陸續发表布魯塞爾上訴法院律師羅·哈梅德先生的文章，他也曾作为法律工作者代表團的一个成員訪問過中國。

“作者在长途旅行过程中所搜集到的丰富的材料，一定会引起我們讀者們的興趣。”

——“最后新聞報”編者

—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全世界了解它的成就和雄偉的計劃，为此，几个月来加倍地扩大邀請工作。

各个不同的比利时代表团因此有机会在格外誘人的条件下作了美好的旅行，各代表团搜集到的材料是丰富的，而且大体上是一致的。

繼企业者們之后訪問中国的，就是法律工作者和教授們；再过几个星期，国会議員們也将前往北京訪問。人們有权利希望，在他們回来的时候，比利时将終于决定同这个亞洲最大的国家重新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必然要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

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在实际上人們可以保留些什么意見，但在客觀上再也不可能否認毛泽东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种种創举是明智的和完全成功的。那些最缺乏远見的觀察家們都意識到，西方民主国家还把中国看作是一片无人知道的土地，乃是以一种不可饒恕的輕率态度，損害了它們本来可以从經濟和文化的立即合作中所能获得的好处。

当这些国家还在犹豫不决，不肯接受已經向它們伸出亲切的手时，另外一些国家却在北京起着日益增长的影响，由于沒有竞争的緣故，它們这种影响也就越发的可靠了。

一些东方国家不仅以各种物資和产品（拖拉机、工具、肥料或医药）供給中国——虽然范围很大，但仍然是很不够的，这些也是中国大声疾呼急需供应的，而且这些东方国家还派遣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技术人員、工程师和專家去了。

这样，东方各国的经济活动，还加上了越来越大的精神渗入。在高等院校，学习俄文已经代替了学习英文或法文，懂得英文、法文，在今天似乎用处不大了。

苏联为了用壮观的、持久的成就来肯定它的影响，已经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里修建了一座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物，命名为“中苏友好大厦”。这些建筑物的建筑艺术虽然不一定是质朴的模范，虽然柱子、屋簷、尖塔、正门和塑象罗列过多，但是毕竟不失为一个经常展览文献和宣传的中心站。

不仅如此，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固定或流动性的展览，把苏联最新式的技术、艺术和式样尽量介绍给中国人民。一天晚上，我在上海市中心散步将近一小时，到处都能看到照片、模型图片和油画，陈列在灯光明澈的玻璃厨中，着重地表示苏联一些巨大企业的规模：如水壩、烏拉尔的工厂、莫斯科地下铁道等等。

这些有系统的、坚持的努力，可能不产生鼓动者所期待的全部结果，因为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自己交给一位新主人摆布而赢取独立的。但是事情仍然非常清楚，如果欧洲文化想影响中国（这不是不可能的），象我们的资本从前在那里所发生的影响一样，那末，马上表明这个愿望并且提出办法，已经是不能再拖延的了。

有点牢骚，但是没有敌意！

新中国对还未承认它的国家没有任何敌意，就是牢骚也微乎其微。

它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所以非常看重别人对它提出的意见。

在我到过的地方，在大学乃至在监狱里，人们不断地向我们征求意见，问我一些欧洲方面考虑这些问题的情况，请我把想到的一切批评提出来。

此外，我不只一次地使用了这项权利——因为显然不应想象今天的中国已经十全十美，以为在五年之内，人们就能够抹掉半个世纪中几乎不停的残酷内战的痕迹——而且我很愉快地感觉到：人们经常以极大的了解接受了我的话。

我很愿意在这里举出周恩来总理在今年四月三十日在北京饭店（即维尔高曾住过的那家旅馆）的大礼堂里，趁五一节之际为招待集中在中国首都的许多代表团而举行的酒会上谈话中的几个片断。周恩来总理说：

“今天有一千多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参加这个招待会。

“高山大洋都不能把我们隔离；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也不能阻止我们的接近。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地欢迎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访问中国。我们诚挚地希望你们旅途舒适，并且非常欢迎你们毫不保留地对我们的工作各个方面提出你们的意见。

“对中国人民来说，特别需要吸取所有国家的人民的智慧和经验来推动他们正在进行的和平建设”。

说服代替了强制

当我们读这个讲话的书面材料时（译成俄、英、或法文的书面材料都分送给出席酒会的人），显然应该考虑到中国人招待外宾时的传统礼貌。

可是，旅行期间收集到数以千计的凭据向我们证实——我

想这是应该指出的——在北京，在共产党政权之下，战争和报复的残酷岁月已经过去，政府已觉得局势牢牢在握，新机构的长期规划也可以着手建立了。可是，说服依然代替了强制，灵活依然代替了生硬，调解依然代替了论辩。

这正是我深入亚洲去旅行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是，我这次旅行并不是没有顾虑的，现在，这次旅行却使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令人敬爱的，他们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察觉到自己的弱点，所以，应该有可能越过思想意识界限，寻求亲善和谅解的准则，使人类战胜忧虑并踏上新的征途。

二

十岁以下的儿童是中国之王：为了他们，什么也不嫌太娇媚，什么也不嫌太漂亮，什么也不嫌太讲究。

无数儿童占满了公园、人行道和店铺，我们每走一步就立刻被他们象蜂群那样闹哄哄地包围起来了。

当他们愉快地跟随着我的时候，我曾经屡次暗中仔细观察过他们。虽然由于我的出现使他们极其兴奋，但我从未看见过他们彼此争吵，相互拥挤或打架。

他们天生的温和性情，同西方顽皮吵闹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看了他们就领会到，如果不先考虑到中国人民性格的特点，并且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人民对待今天给他们规定了的生活规则的态度。

生育的增加和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向政府提出这样大的问题，以致虽然经过一切努力，仍未得到解决。

在工人的新住宅区，甚至在老住宅区，学龄兒童是那么多，以至于班班都得实行二部制：一部分上午上学，另一部分下午上学。

此外，教育还不是义务的——和我谈话的人们红着脸承认了这一点——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员和必要的地方。

青年問題

为了让二部制的青年学生在半天空闲时间里有事可做，人们就开展了体育活动，并且提倡一些类似童子军式的集体活动。

男女孩子们自豪地（因为只有用功和聪明才能这样）带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少先队是培养道德和启发政治的学校。

国家对这些有组织的团体的活动给予莫大的方便。上海的少年宫是一座环绕着宽阔花园的华丽建筑物，人们可以把它同我们的爱格蒙特宫媲美。城里的那些优秀的少先队员可以免费进少年宫，这里不仅有木工室、装订室、绘画室、缝纫室，而且还有音乐舞蹈、体操、歌咏和戏剧艺术训练班。

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钻研自己乐于选择的東西。人们请我参加一个大约有八十個男女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的练习，他们有把握地演唱了几支俄国的或中国的民歌。这些未成熟的歌唱家非常可爱地给我表演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节目。

青年的体格和精神显得都很健康。一天晚上，由于没有注意，我在汉口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丢失了几分钱的钞票。我照常被一大群孩子包围着，为街道的奇异风光所吸引，当一个小孩走来固执地拉着我的衣袖的时候，我早已忘记这件事情了。我向他回过头来，他带着可爱的微笑把我的钞票向我递过来。我

想把这鈔票送給他，好讓他去买点糖果吃，但是他一看见我的手势，就拔腿飞跑了……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嗎？也許是的，但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我們的周圍，这时并没有任何監視……

学校的缺乏

各級学校的教育当然都是免費的。無論学生出身于哪一社会阶层，天分高的人都可以受高等教育。在北京、武汉和广州，我有机会訪問了三个大学。人們給我介紹，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学生是工农子弟。在一个昨天还只有官吏和富有的資產階級才能得到知識和教育的国家里，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食宿和教养都由国家負擔。总的說，他們一毕业就可保証得到工作崗位，成績好的可能留在学校从事研究工作。

大部分的課程是学术性的訓練，但不可否認也有政治教育。

在我特別感兴趣的法学院里，大部分的教授在解放前就已参加教育工作。学生除了学习本国法律和比較宪法外，还学习哲学、經濟学和馬克思主义課程。这些功課在教学大綱中占很大的比重，而且显然是有方向的……

一般文化的不足

学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的一般文化水平是很不够的，因为中国在这时候需要尽快地发展自己的領導干部。

然而，北京大学还只有六千左右的学生（其中女生占百分

之二十)，武汉大学只有三千多一点（其中女生占百分之十五），这个数字与这样众多的人口比较起来，显然是不够的，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解决这个最迫切的需要，国家在正规大学以外还设有速成学校。学生在两年内（而不是五年或六年）可以在那里受到足够适应自己业务的训练，但自然是不全面的。

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学习生活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才开始的。我的翻译，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当我和他参观中国帝王时代的皇宫禁苑时，他全然没有能力给我稍为明确地说明它们的历史、年代或它们的用途。他给我讲革命前的事，好象我们在这里讲朱里·凯撒征服高卢民族以前的事情一样。对他来说，他的国家的传统，显然有着不可探索的、同时也是无足轻重的神秘。

危险是意识到的

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完全了解这种情况的危险和害处，正如周恩来总理最近还提到，他们正在努力想出补救办法。

在等待着情况进一步改善，这年青的一代正以本能的优良人品，以敏锐的感觉和热情来弥补他们由于学习有点“赶任务”而引起的缺陷。

年青一代是严肃的，对自己的责任是自觉的。他们不大注意娱乐和爱情，更不放肆。在整个旅行期间，我从未见过一对恋人彼此紧抱；年青男女在公园里散步，去看戏或看电影，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有时，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手牵着手，象孩子们一样，但这就是最大限度了……

他们感情的表现不仅仅被一种天生的羞耻之心所约束着

——西方国家的青年已經不大理会这一套了——而且还被全新的看法所制約着，这就是如同对其他問題一样，要以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性的問題。

純洁的风气

几年之內妇女們在各个方面已变成同男子平等了，她們完全懂得自己的責任。她們对于增进这种純洁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象所有革命的国家一样，不管它們的傾向如何——新中国对此給予了极大的重視。

我沒有机会深入調查风俗情况，但旧的不良习惯已被彻底摧毁，这是不可否認的。

腐化墮落的城市——上海，已变成一个純洁朴素的都市，鴉片烟館已經关門了，过去的娼妓已經被送到社会改造所去了。听说她們在那里从事正当的工作。

中国进行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的广泛运动，已获得了輝煌的成果，而且到处也特別干净，即使是在最貧穷的棚户區也是这样。

中国人民受到当前任务的激励、鼓舞和吸引，胜过思想意識的激励、鼓舞和吸引，他們虔誠地尊重政府給他們的一切指導。

三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中国的短促逗留期間，我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研究个人的自由在怎样的情况下还得到許可和保証。我應該公正地承認，我不仅有权利到我想去的地方散步，不受任何監視，而且沒有发现任何警察監視或者武力强制

的象征。

在一些战略性的地方（桥梁、机场、铁路等等）当然有军人看守。我在北京附近参观的劳动改造场——里面的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混在一起——周围没有铁丝网和警视台。

但是，除此以外就没有碰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在街道上，看不到巡逻队——而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曾经有过或者现在还有这种使人不愉快的情形。

到处都有秩序

但是，到处秩序井然，居民叫人觉得是带着微笑自愿地遵守纪律，它既不缺少温暖，又不缺少尊严。

我当然不能保证所有这些不知名的过路人他们显出的幸福、积极和健康的情感都是出于内心。再说，我不相信只要问问他们就会使我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既不会看书，又不会写字，而且实际上只注重物质上的满足和最近获得的住、吃、照顾以及合理的殓葬的保证。

谈到知识分子，我得到的材料也不是十分确实的。我所接触到的都靠拥戴新政府。就算他们的拥护是顺从多于乐意，那也显然不会对一个过路的外国人承认的。

但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强调指出，宪法（这宪法是预先经过长期的研究后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八十七条明白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当我提到这部宪法的第十九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镇压和惩办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当然会限制实现上述自由的时候，他们给予我的印象是：对我的想法不了解，同时，似乎他

們自己也不能够正确地知道，不跟着政府走到什么程度，就有变成叛徒的危險。

各党派

譬如，中国現在还有好几个同共产党不同的民主党派。它們在不同的政治會議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重視它們的职权。

我向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問了很多关于他們的活動，結果發現它們的綱領同共产党的綱領基本上沒有多大区别，它們同意同共产党合作建設社会主义。

事实上他們仅仅在吸收党员方面各不相同：这个党吸收知識分子，另一个党吸收商人，第三个党吸收工业家或旧资本家，甚至有一个是結集前国民党党员的政党，它的存在特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权的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中，我会見過一位前蔣介石軍隊的將軍和一位高級官員。这位官員曾經担任过南京政府礼宾司司长。

所有这些“改宗的人”，今天在各行政机关或新組成的部署中占居要职。

不排斥任何人。

还应加以說明的是，假如一切程度上略有不同的政治思想都能这样肯定下来的話，毕竟只有在同政府合作的範圍內才能如此。

我不相信現在在北京能够逆流游泳，但是正如民主同盟副主席，現任司法部部長史良夫人告訴我的：建立一个新政党（照宪法說，这是可以的）必須由社会需要来考虑。而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感觉到有此需要……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少数党派并不从事任何有组织的宣传工作，它们满足于以个人名义称赞在他们们的最优秀党员当中那些有名望、经验和个人威信吸引的人们。

人们猜想到这些党派的存在越来越靠不住了，因为青年几乎一致趋向于战斗的共产主义，它对青年有着无限的关怀。

在政治方面，个人的行动虽然是这样的趋向一致，但是，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却似乎是受到有效的保障。

少数民族问题

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关怀、保护，丝毫没有粗暴的表现，并且逐渐争取同从前不是天生地支持它的少数民族合作。

在这方面，我所进行的最有趣的参观之一，即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这个学院是五年前在北京建成的，现在有一千六百个学生，其中有五百名左右是女生。

这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以新的思想培养和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公职人员、教育、翻译和历史研究的干部。

在这里，学生们不仅仅穿着本民族（如朝鲜、西藏、蒙古等）的传统服装，而且他们受的教育也不一样，能够吃到家乡的饮食（每顿饭有十来个特制菜单）。他们可以在学校里举行宗教仪式。我看到一间房间装饰成西藏庙宇，另一间是教堂，第三间是清真寺……

此外，新的法律，努力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这些地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足够数量的代表。新法律保证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在未得到有关地区的同意之前不得废除或改变。因此，即使婚姻法正式规定禁